



观察

他们或是商朝人的祖先

医巫闾山西麓，石城林立，农耕繁盛

本报记者 郭平

大约4000年前，以医巫闾山为界，青铜时代早期的辽河两岸，两支古老的族群东西并立、各自生长。山以西，夏家店下层文化在辽西山地筑城而居。他们以石为城、以粟为食，留下“长城原型”与空灵的口簧，最终南下中原，孕育了商文明的根基。山以东，高台山文化在辽河平原上生根发芽。他们以高领陶壶与农田灌溉渠标记自己的足迹，最终西迁草原，演变为东胡等游牧民族的先声。它们共同印证了“多元一体”的中华文明并非单向辐射，而是多源交汇。

垫压实，房屋呈圆角方形或圆形。围墙采用“木骨泥墙”法：先立木柱，再抹草拌泥，这样更坚固。有意思的是，围墙已经开始使用黑土坯黄土勾缝或黄土坯黑土勾缝。

有些房址毁于火灾，反而为后人留下了屋顶的秘密——那是由椽条和椽子搭成支架，再覆盖草拌泥做成的。

房屋内部的布局也发生了变化。半地穴时期，灶一般位于房屋的一角；到了中晚期，灶被挪到了房屋的正中，而且灶底垫有石块支撑陶制灶具，这也起到更好的保温作用。考古人员还发现了靠近灶址的沟道，里面有烟痕痕迹——这说明当时已经有了排烟设施。

此外，朝阳上河首西三家遗址中还发现了一处石砌建筑，深度近5米。经确认，那是水井，也是辽宁地区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水井。有了水井，聚落就不再必须依河傍湖而建，人们可以走向更广阔的台地和丘陵，为大型聚落的形成提供了关键的水源保障。

宏大的石城

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正在编写康家屯城址的考古发掘报告。这座城址是1992年配合白石水库建设调查时发现的，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中一座规模较大的石城。

城墙、城门、道路、石墙分隔的房址、窖穴……最令人惊叹的，是城墙上那些角台和马面。

马面，是凸出城墙的建筑。它不仅加固墙体，而且能扩大守军的观察视角。这种设计直到清代仍在沿用。在陕西石峁遗址的相关发现之前，康家屯城址的马面是同类型中年代最早的。1998年，康家屯城址入选“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。

徐韶钢并不想把每一处城防设施都解释为战争的需要，但越来越多的发现，让人感受到夏家店先民那份始终绷紧的“警觉”。

正在发掘的喀左二步尺城址就是一个例子。在地图上，城址位于大凌河边的台地上，而西北方向约500米的山顶上，还有一处约1000平方米的遗迹，正好可以居高临下监视整个城址和周边地带。研究者推断，那很可能是当时的“哨所”或临时营房。

单座城址如此，放大到整个区域，格局更加惊人。

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石城，巧妙地利用河流、山脉等天然屏障，在北、西、南三面筑起三道带状防线，拱卫着中心区域。北线，在西拉木伦河以南，赤峰北部。阴河与英金河一线就分布着42座石城，东西排列，都坐落在河流两岸地势险要的山冈上，背后还有更高的山岭。西线，从河北围场向南延伸到承德滦河右岸，仅承德地区就记录有近300处遗址。南线，在努鲁儿虎山以南，横跨河北、辽宁两省，从承德向东，经平泉进入辽西，凌源、建平、朝阳、北票、阜新一线，密集分布着大量石城。

三条防线围成一个近三角地带，正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域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些城堡带的走向，与后来的燕、秦长城平行甚至部分重合。

考古学泰斗苏秉琦曾这样评价：这种城堡带形式上还不能叫长城，功能却已类似，就像汉代烽燧遗址一样，串联起来就起到了长城的作用，却比汉长城早1000多年，可以称作“长城原型”。

富庶的生活

“与新石器时代晚期相比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农业经济有了长足发展。”徐韶钢说，最直观的证据，就是大量出土的农具。

以康家屯城址为例，发掘出土石铲、石锄、石斧数以百计，还有相当数量的石磨盘、石磨棒。在赤峰二道子遗址，还发现了大量炭化谷物，以粟和黍为主。3000多年前，这片土地上已是五谷丰登了。

农业的发展，推动了社会分工和手工业的繁荣。

徐韶钢特别提到一种陶器——甗。它由上部带孔的甑和下部煮水的鬲组合而成，这明显受中原文化影响，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陶甗个头更大。这种兼具蒸煮功能的炊具，能改善食物的成熟度，借以改善人类的体质。

遗址中出土的海贝，是商品交换的直接证据。这些海贝并非本地所产，应是通过贸易从沿海地区传入。3000多年前，这里已经有了跨地域的交流与流通。

最打动人心的是口簧的发现。这种用动物肢骨制成的乐器，经过去脂、打磨、穿孔等精细工序。演奏时能发出空灵悠远的乐声。口簧通常出土于女性墓主人身旁，人们推测，当年的演奏者多是女子。

南下入中原

大约3500年前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先民离开了辽西地区。

他们去了哪里？

线索藏在纹饰里。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陶器中，部分夔龙纹与商代青铜器纹饰高度相似，且年代更早。考古学家认为，这很可能是商代青铜器纹饰的源头之一。

线索也藏在骨头里。安阳殷墟中，属于商人中小贵族墓的墓主人，绝大多数具有北方人种特征。这说明，商族的祖先很可能与北方地区的古代居民有着密切的关联。

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综合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，提出夏家店下层文化很可能就是先商遗存，后来入主中原。他认为，商人尊东北方，不仅因为辽西是先商时代的一个重要文化中心，更因为这里可以追溯到更早的红山文化。

3000多年前，这支辽河上游的族群，带着他们的陶器、口簧与农耕技术，向南走去，最终融入了中华文明的洪流之中。

词条

夏家店下层文化

我国北方青铜时代早期文化。1960年发现并确认于内蒙古赤峰夏家店遗址，年代约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，与中原夏、早商文化相当。主要分布在燕山山地和辽西及内蒙古东南部地区。以定居农业为主，兼营畜牧。



阜新勿欢池遗址出土了我国迄今发现较早的古代农田灌溉系统之一。

东胡从这里走来

医巫闾山东麓，水渠纵横，农牧并举

本报记者 郭平 文并摄

因地制宜，形成农牧结合的生产方式。后来，他们西进辽西、走向草原，创造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游牧文化。

独特的陶器

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徐韶钢每到一地，总爱往博物馆跑。他的“土办法”是看展品——哪些地方展出过高台山文化的器物，大致就能勾勒出这个文化的分布版图。

目前，沈阳、铁岭、阜新的博物馆都有这类藏品。听说锦州也有，他眼睛一亮：“得去看看”。

高台山文化的“名片”是高领陶壶。沈阳博物馆青铜时代展厅里，一个独立展柜专门陈列着它们。手制粗砂红陶，火候不高，质地疏松，外表却磨得光滑。直筒形颈占了器身1/4以上，在同期陶器中独树一帜。

1973年，新民高台子镇腰高台子村首次发现这类遗存。此后，彰武平安堡、阜新平顶山、勿欢池等遗址陆续现身，一种独特的古老文化逐渐清晰。1989年，考古界以发现地正式命名“高台山文化”。

它的核心区在柳河流域，东到辽河，西抵医巫闾山，北达内蒙古通辽市库伦旗，南至古辽河沼泽边缘。目前发现的遗址不到20处，远少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3000多处。徐韶钢解释，不是当年不繁盛，而很可能是遗址埋得深——辽河平原风沙大，地表很难采集到遗物。像勿欢池遗址、代海墓地这些重要发现，多是在修路、建水库时“碰”出来的。

吉林大学教授赵宾福研究发现，高台山文化并非凭空而来。竖耳筒形罐、袋足甗等器形，透露出山东半岛岳石文化的影响——经由辽东半岛辗转传来。外来的三足陶器与本地传统碰撞，催生出土质面高、素面甗，成为高台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。

惊人的发现

高台山先民没留下宏伟的城址，他们的房址是半地穴式的，石斧、石铲表明他们已开始种地，陶网坠、石铍、青铜铍则提示渔猎同样重要。农牧渔猎并举，为后来的游牧经济埋下伏笔。

1992年，阜新勿欢池遗址的发掘让考古界吃了一惊。工地上，纵横交错的沟渠清晰可辨——干渠、支渠、毛渠层层分叉，交汇处还有分水、泄水设施。这是我国迄今发现较早的古代农田灌溉系统之一。考古学家孙守道敏锐地提出，这为稻作北上、东传朝鲜日本，提供了一条新的传播路径猜想。

另一项让人过目不忘的，是高台山人人的墓葬。墓坑一端挖出浅瓮，

瓮里端放一只高领壶，壶上倒扣陶钵——这种葬式在其分布区内高度统一，折射出强大的文化认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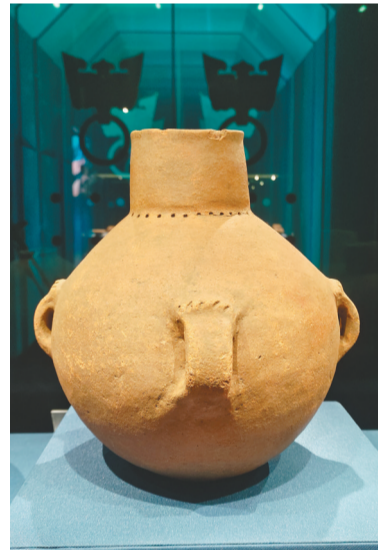
但徐韶钢在主持阜新代海墓地发掘时，看到了“异类”：有的墓除了浅瓮，墓坑底部墓主脚下还有随葬陶器。“这是受西边邻居的影响。”他在纸上画着剖面图，“反过来，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址里，偶尔也能见到高台山文化的影子。”

两种文化隔河相望，既有坚守，也有往来。

平原到草原

高台山文化的先民后来去了哪里？很长时间内，这是个谜。

1990年，考古学家张忠培在大连“环渤海考古”会议上首次提出：夏家店上层文化是由高台山文化发展来



高台山出土的陶器。

的。次年，吉林大学朱永刚教授也发表了同样的观点。

陶器是最忠实的见证者。两种文化都用夹砂红陶，泥圈套接，素面为主，口沿外叠唇，流行直腹鬲。从高台山到夏家店上层，器物组合一脉相承，演变轨迹清晰可循。

赵宾福进一步推断：大约在西周初年，高台山文化或许迫于某种压力，整体向西迁移至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山地，在那里演变成夏家店上层文化，之后又向南扩展到老哈河、教来河流域。

而夏家店上层文化，已被学界普遍认定为东胡的遗存。

从辽河岸边的半地穴聚落，到草原上纵马驰骋的东胡部落，高台山文化像一把穿越千年的钥匙，打开了东北游牧民族的起源之门。那些朴素的高领陶壶、纵横的水渠、安静陪葬的墓瓮，无声诉说着一个族群如何适应自然、在变局中走出自己的路。



辽宁省博物馆中复原的康家屯石城遗址模型。

本报记者 卢立业 摄

国宝AI了

石头会“唱歌”

本报记者 孙明慧 文并摄

在辽宁北票大板镇康家屯石城址里，曾出土了一件石磬。

它并非普通的响器，而是上古帝王“五音听政”的信物，也是宗庙祭祀中的圣物。

与闻名于世的殷墟虎纹石磬相比，康家屯石城址出土的这件石磬，打磨的时间，可能还要更早。



扫码观看视频



石磬